

外国历史小丛书

罗马晚期奴隶起义

商务印书馆

蔡 鸿 生



1.1059

21

外国历史小丛书

罗马晚期奴隶起义

蔡 鸿 生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外国历史小丛书
罗马晚期奴隶起义
蔡 鸿 生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25

1981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 千

印数 1—5,300 册

印张 1 7/8

定价：0.18 元

目 录

一	陷入绝境的罗马帝国	1
	(1) 社会危机	1
	(2) 斗争形势	9
二	高卢烈火	11
	(1) 高卢的罗马化与马特努斯起义	11
	(2) 巴高达运动的高涨	14
	(3) 转战西班牙	19
三	北非风暴	21
	(1) 罗马征服北非后对柏柏尔人的奴役	21
	(2) 阿哥尼斯特的思想体系及其社会本质	25
	(3) 反奴隶制的“斗士”	27
四	色雷斯战歌	31
	(1) 色雷斯的罗马化及其社会后果	31
	(2) 瓦伦士的暴政	34
	(3) 在“贱民头目”指挥下的战斗	35

五 怒吼的多瑙河	39
(1) 哥特移民的政治地位和宗教信仰	39
(2) 压迫引起反抗	42
(3) 罗马统治阶级的反扑	46
(4) 斯卡马尔运动	48
六 结束语	51
大事记	54

一 陷入绝境的罗马帝国

(1) 社会危机

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是西方奴隶主阶级垂死挣扎、奴隶和其他劳动群众奋起斗争的历史。

在安敦尼·庇护(138—161年)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湖。中央政权从各省榨取大量贡赋，国库聚积了六亿七千五百万银币。商路畅通，市场繁荣，仅西班牙一省就有大小城镇数百座。对外贸易远达印度和中国，东方的香料、宝石和丝织品，畅销意大利。首都罗马拥有百万人口，邸第林立，被誉为“永恒之城”。

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活，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在这里，自由民鄙视劳动，奴隶主不劳而获。他们每年要过一百八十个节日，纵情挥霍，在观赏逐兽、剑斗和马车赛中虚度时光。宫廷奢侈腐化，仅御用的美容师就多达数百人。这种寄生性的生活，长期靠奴隶们的血汗来维持。到了公元二世纪后，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刺激和希腊文化的传播，罗马主要生产部门的技术状况，

逐步发生变化。手工业中出现熔炉、卧式纺车,并分出铸工、铁工、磨工等专门手艺。农业虽然进步较慢,也开始采用带铧铁犁、收割器和水磨,劳动分工更加细密,有刈麦手、割草人和养蜂工等。发展起来的生产力,需要一种具有劳动兴趣、关心劳动成果的生产者。奴隶历来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连生命也没有法律保障,当然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三世纪初,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公开宣称:“从民法观点看,奴隶不值一提。但按自然法而言,则应人人平等。”这种把奴隶当人看待的新观念,标志着罗马陈旧的社会关系已经难以保持了。

晚期罗马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从二世纪末开始,至三世纪进一步加深的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总危机,通称为“三世纪危机”。它以意大利为中心,由西而东遍及各省。其中包括劳动力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

帝国初期意大利的奴隶制庄园,是靠大规模转贩战俘来维持的。这种战俘奴隶被强迫劳动,在榨坊和磨房中代替畜力,使用粗笨工具,劳动生产率很低,死亡率却很高。为了摆脱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常常逃入森林和沙漠,另谋生路。如何保证奴隶劳动力不断更新,是帝国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从二世纪末开始,散

居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族，已经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不仅有力量遏制罗马的军事扩张，还使它的边防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罗马军团纪律松弛，素质下降，引起了“军队的蜕化迫使国家只能进行防御”^①。从哈德良（117—138年）时期起，随着帝国由进攻转为防御，战俘数目锐减，奴隶来源大为缩小，只能从国内去解决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但是，通过自然增殖获得的家生奴隶，养育期长，身价比战俘奴隶昂贵得多。在这种情况下，



奴 隶

下，“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②这样，奴隶主不得不寻求新的剥削方式，授产制和隶农制逐步发展起来。奴隶主把部分牲畜、土地或作坊分给奴隶经营，也称为“特许析产”。财产所有权仍属奴隶主，奴隶可获得一些个人收入，并自行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5页。

配。授产制引起奴隶阶级的分化,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则接近工匠、小商或佃农的地位。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中部的奴隶制庄园,已经用自由佃耕者作为辅助劳动力。他们向奴隶主租种小片土地,按定额纳租(约占收获量的 $\frac{1}{3}$),称为隶农。二世纪时,隶农人数渐多,除破产自耕农外,还有奴隶补充进去。至三世纪时,隶农制在外省也被普遍采用了。隶农与奴隶不同,有部分人身自由和一定的诉讼权,经主人允许可以出售自己的产品。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身。

授产制和隶农制流行之后,奴隶与隶农和破产农民的地位日益接近。在帝国西部各省,小农经营已经变成农业的基本形式。奴隶主的大庄园经济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不必卷入商品流通的范围。城乡经济联系逐渐松弛,城市生活衰落,工商凋敝,税源锐减。为了弥补财政亏空,罗马政府发行劣质货币。孔茂德(180—192年)统治时期,银币已贬值 $\frac{1}{3}$ 。卡拉卡拉(211—217年)即位后发行的金币,比原来成色减少17%,后来又发行一种含银量只有5%的新币。币制混乱,毫无信用,造成物价不断上涨。在城市里,窖藏金银、拖欠国税的现象不断出现。帝国政府又变换花招,勒令市议员缴足欠税,否则不得离城外出。甚至将市议员职务变成世袭公役,强迫儿子继承老子的差事并承担义务,

许多市议员被迫逃官逃税，有的竟被弄得一贫如洗，沦为隶农。市议员阶层的破产和市政的腐败，结束了罗马城市制度的黄金时代，使社会生活的中心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地方势力抬头，各据一方，帝国行政的完整性一去不复返了。

行省贵族依靠地方武装，互相倾轧，篡夺帝位。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193—211年)登基后，滥发兵饷，借以收买军心。近卫军的饷银从每年一千银币增至一千二百五十银币，其他军团的士兵也从每年的三百银币增至五百银币。塞维鲁临终时，留下这样的遗训：“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不必理睬！”后来的罗马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奉行这一信条。经过不断的培植，军队成为三世纪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常常弑杀旧主，拥立新帝。从253年至268年，帝国分崩离析，出现了“三十僭主”的混乱局面。

罗马政局不稳，直接影响它的国际地位。三世纪初，萨珊王朝统一伊朗，成为罗马帝国东境的强邻。260年，波斯军队进逼叙利亚，罗马皇帝瓦勒里安(253—260年)战败，被俘而死。帝国北境同样告急。哥特人侵入色雷斯和小亚细亚，与罗马军队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年(236—278年)的“多瑙河战争”。西部边防也不平静，经常受到莱茵河外日耳曼人的进攻。阿勒曼尼

人曾一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兵临罗马城下。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动乱年代里，民间流传着一种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教。三世纪中期，基督教诗人康莫狄亚努斯预言：哥特人将执行上帝的意旨，攻陷罗马，降福消灾，使永恒的快乐弥漫大地。“蛮族与基督教徒情同手足，元老院屈尊受辱，官吏和贵人降为奴仆”。这种神秘主义的语言，曲折地反映了罗马被压迫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

罗马统治阶级为了摆脱日益逼近的危机，在三世纪末，将帝国的统治形式由元首制改为君主制。近卫军长官出身的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是罗马君主制政体的奠基人。他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国家机器的措施：在军事上，扩充帝国武装力量，建立七十二个军团，分机动兵和边防军两类，总数六十万人；在行政上，缩小行省规模，全国分置一百零一省，不准总督兼掌兵权；中央一级划成四大辖区，由两个奥古斯都和两个恺撒共管，即“四人共治”制，戴克里先权位最高，号称“君主”，以“丘必特”^①之子自居。他既然用罗马旧教来神化皇权，当然就把基督教看作异端邪说了。303年，皇帝下诏取缔基督教，禁止布道，没收教产。

^① 古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司雷电风雨，被认为是荣耀和威力的象征。

实际上，四世纪初的基督教，早已丧失平民性质，变成富人的宗教了，以致“好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认为接受这种妄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① 这位新皇帝一改上届皇帝戴克里先的做法，用象征基督教的十字代替罗马军旗上的异教之鹰，并于313年颁布米兰敕令，维护基督教，宣布教士免税免役，使教会彻底蜕化为罗马奴隶制帝国的统治工具。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代皇帝的共同特征是企图动员上层建筑的力量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基础，但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第一，为了扩大兵员，不得不吸收日耳曼人加入军队。君士坦丁一次就招募了四万名哥特人作雇佣兵，并破格提拔其中的一批人为将领。军队的“蛮族”化，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第二，用日耳曼移民充实边区，无异饮鸩止渴^②。罗马作家佐西莫斯面对帝国居民成分的变化，不胜慨叹道：“好多省内的本地人口竟少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让蛮族人移殖到那里来接替他们，连地名也改变了。”多瑙河南岸诸省，地处边防，日耳曼移民特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

② 用毒酒解渴，比喻只求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将来的祸患。

多。他们与境外的同族人只有一水之隔，随时可充当反罗马的内应。第三，强化国家机器的结果，使官僚系统变得庞大无比。文官武将，争权夺利，贿赂公行。从京官到边吏，人人拚命捞钱，不思图治。罗马奴隶制国家疯狂榨取臣民的膏血，逼得他们走投无路，苦不堪言，连基督教作家拉克唐提乌斯也深感不安地记述：

“每一地方、每一城市都派去大批官吏和税吏，弄得人人自危。这对社会并无补益，只会带来暴行，带来接二连三的判决、放逐和勒索。”

君士坦丁以后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日耳曼人步步进逼，大有江河日下之势。375年，米兰主教阿姆布罗修斯在一次葬礼中，带着没落阶级特有的感伤致悼词说：“他诀别了我们，以免落入蛮族之手；他诀别了我们，以免目睹世界末日的来临，以免眼见亲人和同胞的死难！”这首悲凉的挽歌，唱出了罗马奴隶制帝国岌岌可危的暮年。

事实证明，用君主制代替元首制，不可能解救帝国的社会危机，“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7页。

(2) 斗争形势

晚期罗马奴隶起义是长期的、反复的、绵延不断的伟大斗争。

前期包括整个三世纪，是奴隶起义的开始阶段。随着奴隶制危机的加深，罗马中央政权逐步失去对行省的控制能力。七十年代，高卢、北非和叙利亚等省政变频繁，统治阶级分崩离析，高卢西北部首先揭起反奴隶制的义旗，小亚细亚也发生小规模奴隶暴动。但是，运动尚未席卷广大地区，也没有及时地与外族进攻相配合，以致奴隶主阶级能够重新集结力量，进行反扑，使运动在三世纪末转入低潮。

后期包括四至五世纪，是奴隶起义的高涨阶段。一方面，罗马皇帝的专制政策，使中央与行省的矛盾、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日耳曼人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莱茵河和多瑙河，涌入帝国内。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推动下，罗马奴隶起义重新高涨起来，并形成三大斗争中心，这就是高卢、北非和色雷斯。上述地区为什么会成为直接打击罗马帝国的斗争风暴的主要源泉呢？

长期以来，罗马奴隶主阶级对地中海世界推行罗马化的强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民族独立和地

方传统，但并不能消除行省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三世纪危机”使意大利奴隶制经济陷入绝境的时候，“在各省还有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他们也许还同公社所有制有联系）”。^① 高卢的西北部、北非的西部和色雷斯，就是这样的地区。当地的统治阶级，用牺牲小农经济的办法来缓和奴隶制危机。在新的剥夺面前，自由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债务奴隶，有的被迫请求“庇护”，变成隶农。除破产农民外，补充奴隶、隶农队伍的，还有附近的外族居民，如高卢的阿勒曼尼人、色雷斯的哥特人和北非的柏柏尔人。这种状况，有利于形成罗马奴隶、隶农与自由农民的大联合，以及罗马劳动群众与日耳曼劳动群众的大联合。另一方面，高卢、北非和色雷斯均地处边防，是罗马帝国与“蛮族”地区的交接点，能够直接利用外族进攻所引起的有利形势，及时开展反奴隶主政权的斗争。至于帝国的腹地，则相对安定。罗马政府从各省搜刮的财物，源源流入意大利，暂时收到以外养内的成效。同时，又采用重税政策限制外省葡萄和橄榄等农产品入口，以保证台伯河流域奴隶制庄园的繁荣。因此，在三至五世纪罗马社会的大动荡中，奴隶制最发达的意大利并没有变成斗争的前线，而奴隶制相对不发达的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2页。

卢、北非和色雷斯，却成了反罗马统治的风口浪尖。

罗马晚期奴隶起义的广泛社会基础，产生了相应的斗争形式：有奴隶和隶农的武装起义，如高卢和西班牙的巴高达运动，以及“普罗科比政变”期间色雷斯的奴隶、隶农起义；有人民异端运动，如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有“蛮族”移民起义，如色雷斯等地的哥特人起义；还有所谓“强盗”运动，如诺里克（奥地利）和伊利里克的斯卡马尔运动。奴隶起义的多种形式，反映了这场斗争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同时又表明罗马奴隶主权已经百孔千疮，民怨沸腾，人人喊打了。

二 高卢烈火

（1）高卢的罗马化与马特努斯起义

高卢是巴高达运动的故乡。

早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就开始向高卢扩张。公元前16年，奥古斯都屋大维（前27—公元14年）将全部高卢地区分成四省：除原有的那尔波高卢省（法国东南部和瑞士西部）外，塞纳河以东至莱茵河以西的地区为比利其卡省（比利时和卢森堡），塞纳河与罗亚尔河中间的地区为鲁格敦高卢省（法国中部和西部），罗亚尔河以南至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区为阿奎坦尼亚省（法国

西南部)。恩格斯说：“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① 不过，由于被征服的时间先后不一，距离意大利也远近不同，所以，高卢各省罗马化的程度差异很大。

那尔波高卢接近意大利，被征服较早，应征加入罗马军团的人数又多，罗马化程度最深。阿勒拉特和那尔波等殖民据点，很快变成富庶的工商业城市。许多奴隶和释奴，在手工作坊充当锻金匠和琢石工。贵族庄园也大量使用奴隶，如豪族普罗库鲁一家，就有两千名奴隶。在高卢其余地区，由于罗马统治较薄弱，奴隶制尚未普遍确立，还有大量崇拜本地神灵、经营个体经济的自由农民。尤其西部阿尔摩利卡一带，公社残存的惯例，仍被居民奉为准则。克勒特人^②的某些旧俗，如被庇护人或奴隶与家主合葬一墓，依然历久未废。总的说来，罗马奴隶制与克勒特农村公社制并存，就是征服后高卢的社会特征。

但是，随着“三世纪危机”的到来，高卢原有的社会生活条件遭到进一步破坏。意大利式的奴隶制庄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1页。

② 克勒特人是高卢的古代居民。